

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了诸多可喜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勃勃生机。6月8日是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本版今天刊发3篇文章,与读者分享考古工作、非遗保护和典籍研究领域的生动实践。——编者

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提供了直立人演化及其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证据;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薄刃斧石器组合突破了国际学术界关于“莫维斯线”的传统认知。新发现古人类化石填补人类起源关键缺环。

万年来的文化史内涵愈加丰富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一系列新发现,不断刷新认知。山东赵家徐姚遗址发现距今1.3万年前的古人类临时性活动营地,出土国内迄今所知最早的陶塑和北方地区最早的陶器;河北四台遗址发现距今1万年前的定居村落以及特征鲜明的陶器、细石器,展现出人类生存方式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栖居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转变。农业起源研究持续深化,“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更加清晰。河北兴隆遗址出土距今7700年左右的炭化黍,是中国北方地区粟黍驯化和旱作农业起源的重要证据。“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研究”项目启动实施,继“万年上山,世界稻源”重要发现20年之后,浙江施岙遗址发现河姆渡文化早期至良渚文化时期的大规模稻田,生动展示了生产力发展为史前社会复杂化发展与文明起源积蓄的强大动力。

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脉络更加清晰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等重大项目同步推进,生动揭示各区域文明起源与发展历史进程,深入推动中华文明起源模式和理论综合研究。陕西石峁遗址皇城台揭露出史前时代壮观的城址,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实力;辽宁牛河梁遗址新发现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山东焦家遗址新发现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浙江良渚、湖北城河、湖北屈家岭等遗址发现一系列大型水利设施,彰显了古人对自然的认知改造以及当时较强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伴随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夏商文明与早期王朝国家研究有新突破

“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系统

实施,夏商周三代都城考古深入推进。河南二里头遗址揭示出“井”字形主干道划分出的宫殿区、祭祀区、作坊区的多网格式布局;殷墟王陵区新发现外围环壕、大规模祭祀遗迹,周边区域发现环壕聚落、大型铸铜作坊;陕西周原遗址确认了西周时期的城址,系统呈现了早期王朝都邑的宏伟气象和对后世城市营建的较大影响。早期王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陕西寨沟遗址揭示商代大型方国聚落、墓地与发达的青铜文明,四川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祭祀坑再谱西南地区考古新篇章。甘肃四角坪遗址、陕西下站遗址揭示大型建筑与祭祀遗迹,安徽武墩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大量漆木乐器、漆木俑等,生动展现了东周秦汉时期的祭祀和礼乐制度。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画卷壮丽铺展

新疆考古、西藏考古的相关工作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框架下协同推进。国家文物局协调12家考古机构的21支队伍赴新疆、西藏开展联合考古攻关工作。新疆阜康车师、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遗址为寻找西域都护府提供了重要线索,石城子遗址被推断为汉代疏勒城,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被确认为唐代的“沙堆烽”故址,“春景渐芳,唯和未足,不委如何”的一纸竹简跨越千年款款道出戍边将士深沉的家国情怀。西藏当雄墓地、甘肃吐谷浑王族墓葬、吉林磨盘村山城、陕西清平堡遗址等,以更加丰富翔实的资料阐释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对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城市考古、石窟寺考古、长城考古、大运河考古等重点领域考古研究持续推进,一系列重要成果系统展示了古人在治理国家、发展文化艺术、发明先进技术、对外文化交流等领域取得的灿烂成就。

未来,国家文物局将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运用更多考古成果,深入研究阐释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图①、图②: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出土的陶器。
图③: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出土的雕花象牙柄。
图④:南海西陆坡一号沉船遗址出土的瓷器。
图⑤:安徽武墩墓出土的漆耳杯。

以上图片均为国家文物局提供
版式设计:蔡华伟



考古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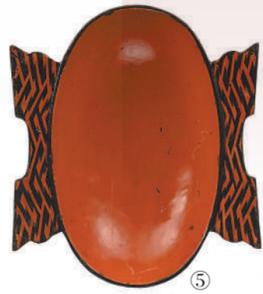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强调要实施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十三五”以来,国家文物局通过实施“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国家文物局明确“考古中国”重点实施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领域考古项目,重点支持人类起源、早期社会、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与早期王朝国家、水下考古、文明比较研究等11个重点研究方向。

截至目前,国家文物局共批准立项夏文化研究、蜀道考古研究、新疆考古、西藏考古等18个重大项目,批复实施520余项主动性考古项目,时间范围跨越旧石器时代至宋元时期,地域空间覆盖24个省(区、市),90余家考古机构、科研院所与高校的110余支队伍积极参与其中。在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陕西清涧寨沟遗址、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等都是“考古中国”的重点项目。中央财政加大资金支持保障,文博工作者围绕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深入推进多学科、跨区域联合攻关,不断取得丰硕成果。

百万年人类繁衍生息的历史图景更加生动

中国早期人类起源与现代人演化与扩散的时空框架更加丰富完善。河北泥河湾遗址群考古基本建立了近200万年的旧石器文化时空框架;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发现的欧亚内陆同时代最为



「考古中国」溯源中华文明

关强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更加迷人的光彩

王晨阳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发挥积极作用。

通过健全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基层的非遗保护热情被充分激发了出来。对本行政区域内非遗代表性项目的认定,体现着当地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的特色,体现着对当地人民创造力的重视和尊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把本行政区域内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认定出来,提高其“可见度”,不断加大非遗项目保护传承的支持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加大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财政支持,各地对非遗项目也安排了经费支持。目前,我国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的健全完善,为非遗的保护传承提供了有力保障。北京、河北、浙江3个省份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为539个子项,在有关部门近期开展的四级非遗项目试点调查中,这3个省份的

四级非遗项目达3万多项。我们可以看到,在地方日常举办的非遗传播展示活动中,担任主力的更多是一些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他们与当地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很接地气,可以激发人们的参与热情与意愿。

非遗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互为依存,协同共进。比如,“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带动了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的保护与发展。文化生态保护区已经成为非遗保护的一种理念和方法。文化和旅游部不断推进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的落实。以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区(榆林)为例,多年来,榆林市深入开展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陕北民歌、秧歌、剪纸等一大批非遗项目传承队伍不断扩大。2024年“古城过大年”活动开展了全国秧歌展演,榆林本地和各地

的几十支秧歌队连续12天在古城表演,每日最多近15万人次现场观看。

近年来,非遗的展示也在提质升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已于2022年2月开馆,大运河非遗展示馆、浙江省非遗馆、广东省非遗馆相继开馆。非遗馆成为人们了解非遗、体验非遗、传承非遗的新场所。

当前,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如何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层次上融合,是重要课题。我们要进一步鼓励非遗传承人将非遗融入旅游空间,使非遗成为丰富旅游产品的重要选项。在旅游发展中,要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环境和空间,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久保护和永续利用。(作者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党委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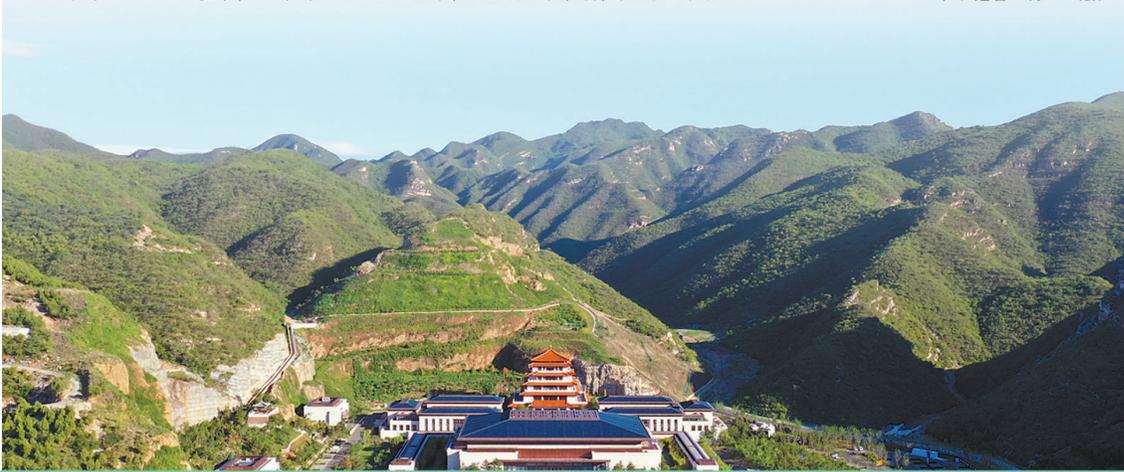
图为航拍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本报记者 陈斌摄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推出了“气象万千——中国非遗保护实践主题展”,充分展示新时代以来非遗保护传承的良好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中国积极开展非遗保护实践,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之路。

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主要围绕传承群体展开,不仅要关注他们的传承现状,更要考虑他们的长远发展;不仅要关注他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在精神上给予更多支持与肯定。自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实施以来,举办各类研修、研习、培训1330余期,149所大学参与其中,超过10万人次参与培训,一些省区市也开展了本地的非遗研究培训工作。这些研修计划的学员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非遗服务重大国家战略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通过建设非遗工坊、培养非遗传承人、畅通销售渠道等方式,不少实践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累计带动百万人就业,多名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目前,各地非遗工坊已达6700多家,其中2100余家位于脱贫地区,覆盖了不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为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兰台洞库,参观“汉藏蒙满文大藏经雕版合璧”和“《四库全书》合璧”库展,详细了解馆藏精品版本保存情况。“合古今而集大成”的《永乐大典》,以前为纲,以字隶事,习近平总书记也牵挂着它们的整理修缮。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由山东大学牵头,国内70余所高校200余位专家应邀参与,山东大学教授杜泽逊担任项目主持人。《永乐大典》整理研究有哪些新发现新进展,接下来有哪些安排?近日,我们采访了杜泽逊。

《永乐大典》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七八千种典籍。600年风雨沧桑,经逢战乱、火灾、盗匪、流散,《永乐大典》从成书之初的万册巨帙到现在存卷不足全本总量的4%。近现代以来,众多学者为《永乐大典》的保护、整理、研究而奔忙。文史学家郑振铎曾感叹:“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活,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

2020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征求《永乐大典》整理工作的意见,作为小组成员,杜泽逊提出对《永乐大典》做系统整理并给出6条建议。2021年,“组织《永乐大典》敦煌文献等重点古籍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列入《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

“重视典籍文章的修治,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杜泽逊向我们举例说,北宋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总计达3500卷。“今天要研究中国小史,需要看《太平广记》;研究唐代文学,《文苑英华》是头等重要的书。”再比如《九章算术》,到清代乾隆时期仅存5卷,后4卷失传。所幸明代修《永乐大典》时大都引用,到了清代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基本恢复了《九章算术》的全貌。《旧五代史》一度失传,如果不是四库馆臣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一条条辑出来,“二十四史”恐怕只能称作“二十三史”。

在杜泽逊看来,“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典籍,记载了古人的社会理想、家国情怀、精神追求、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很多古籍版本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永乐大典》以类书编纂方式将它们保存下来,因此被视为“辑佚古书的渊藪”。把分散在《永乐大典》各个角落的“隐书”辑出来,让它们重现人间,这是传递到杜泽逊等学者们手中的“接力棒”,也是他们千方百计要做好的一件大事。

《永乐大典》成书时有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大约3.7亿字。即使现存不足全本的4%,也有400多册、800余卷,高质量完成整理研究任务,是一项极大的挑战,也是一项艰巨的考验。

第一步要解决“看不懂”的问题。“看不懂怎么办,那就加标点。”杜泽逊说:“标点、注释是为了现代人更好地理解,阅读。阅读没有障碍,才能够接续传承,就像宝物一样,只有接在手上才能传给后人。”

《永乐大典》用圆戳断句,800多卷,几乎每一卷都有10余处错误。《永乐大典》包揽百科,从天文历法、礼仪宗教、地理军事到中医中药再到税收、航运,有很强的专业性。涉及不同学科行业的200多位专家,采取网上办公的方式,先把细则梳理清楚,然后根据专业所长,每人分配两卷,两人一组,改过之后再相互复审。到2023年底,200多位专家已看完两遍。杜泽逊介绍,今年,项目组的十几位骨干专家又组织了一轮“会诊”,大家面对面、一册册地复核,依然发现一些问题。于是,又从200多位专家中聘请了100多位,作为《永乐大典》标本的定稿专家。“这一轮审校完毕,再经过骨干专家的复审,就可以陆续交付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本的《永乐大典》。”杜泽逊说。

下一步进行“分书重编”的工作。《永乐大典》具有资料性、工具性,其中引用的文本对于研究者具有3个功能:找到已经失传的典籍,找到传世古籍的早期版本,找到分类的资料。杜泽逊和学生采取先拆书再重新编排的办法。杜泽逊说:“就像拆房子,拆的过程中知道当年是怎么黏合起来的,把拆出来的砖、瓦、木头分类。”按照计划,拆完后将形成《永乐大典》版本的《诗经》《周易》《史记》《汉书》等。全部完成后,再形成一个“分书重编”版本的《永乐大典》,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杜泽逊研究生一毕业,就参加了王绍曾主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还参加过季羨林、戴逸两位专家主持的重大项目。作为“《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主持人,他坦陈对许多参与的学者怀有一份歉意。重大工程势必旷日持久,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古籍整理被视为冷门学问,要求参与者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在考核、待遇等方面不断完善,大家才能更无后顾之忧,在冷门中沉得下心、钻得进去。”杜泽逊说。

“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前提是先接触文化遗产,看得懂,才能传承,进而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杜泽逊说。千方百计呵护好传承好我们的典籍,“把这件大事办好”,任重道远。

千方百计呵护好传承好我们的典籍

本报记者 任姗姗 赵悦汝